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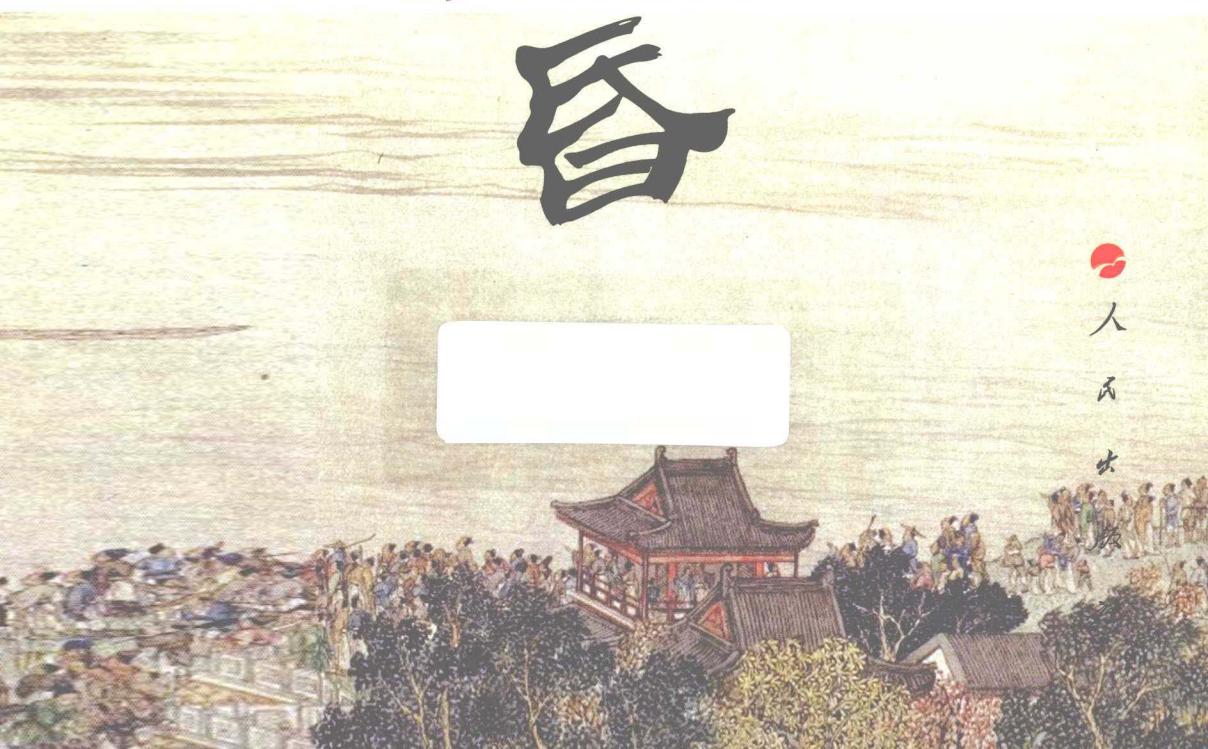
陈连营◎著

帝国黄昏

——徘徊在近代门槛的
中国社会



人民
出版



陈连营◎著

帝国黄昏

——徘徊在近代门槛的
中国社会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世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黄昏：徘徊在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 / 陈连营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01-011228-2

I. ①帝… II. ①陈… III. ①社会史 - 研究 - 中国 - 近代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23206号

帝国黄昏

DIGUO HUANGHUN

——徘徊在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

陈连营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3.25

字数：378千字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01-011228-2 定价：49.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目 录

开篇 傲慢的“英国佬”

——由中英礼仪之争说开去

- 一、清政府的尴尬 4
- 二、西方的底气 13

上篇 帝国的困境

——鸦片战争前中国面临的几个社会问题

- 一、经济发展的迟缓与民生凋敝 23
 - (一) 经济的缓慢发展 23
 - (二) 民生问题的日渐严重 27
- 二、民族危机的出现与鸦片问题 35
 - (一) 民族危机的出现 35
 - (二) 鸦片问题的日渐严重 39
- 三、吏治腐败与国家统治能力的衰退 46
 - (一) 吏治腐败问题的严重化 47
 - (二) 封建财政制度的崩溃 54
 - (三) 军备的全面废弛 57
- 四、阶级对立与社会动荡局面的加深 62
 - (一) 社会矛盾的滋长 62
 - (二) 起义斗争不断 63

中篇 令人纠结的改革

——嘉道时期统治政策的调整

- 一、嘉庆维新 70
 - (一) 铲除和珅专权势力 71

(二) 倡导务实之政	74
(三) 政治维新难期	78
(四) 腐败根深蒂固	81
二、整理钱粮亏空	95
(一) “徐徐办理”难为继	96
(二) 亏空愈清愈多	100
三、整理旗务	109
(一) 八旗生计问题的严重化	109
(二) 整理旗务的具体措施	111
(三) 解决旗人生计的根本出路	118
四、治河、理漕与海运之争	119
(一) 治理黄河	119
(二) 整理漕务	134
(三) 河运与海运之争	148
五、矿业限制与禁止民人出关	154
(一) 对矿业生产的限制	154
(二) 限制民人出关	162
(三) 矿禁、关禁与民生	172
六、文化专制政策的调整	176
(一) 文字狱政策的停止	176
(二) 严禁不经小说	183
(三) 严禁天主教的蔓延	189
七、关于稳定与变革	197

下篇 士人的觉醒

——嘉道时期文化思想界的变动

一、“汉宋之争”及其演进	208
(一) 乾嘉汉学及其成就	209
(二) “汉、宋”之争局面的出现	218
(三) 会通“汉、宋”学风的形成	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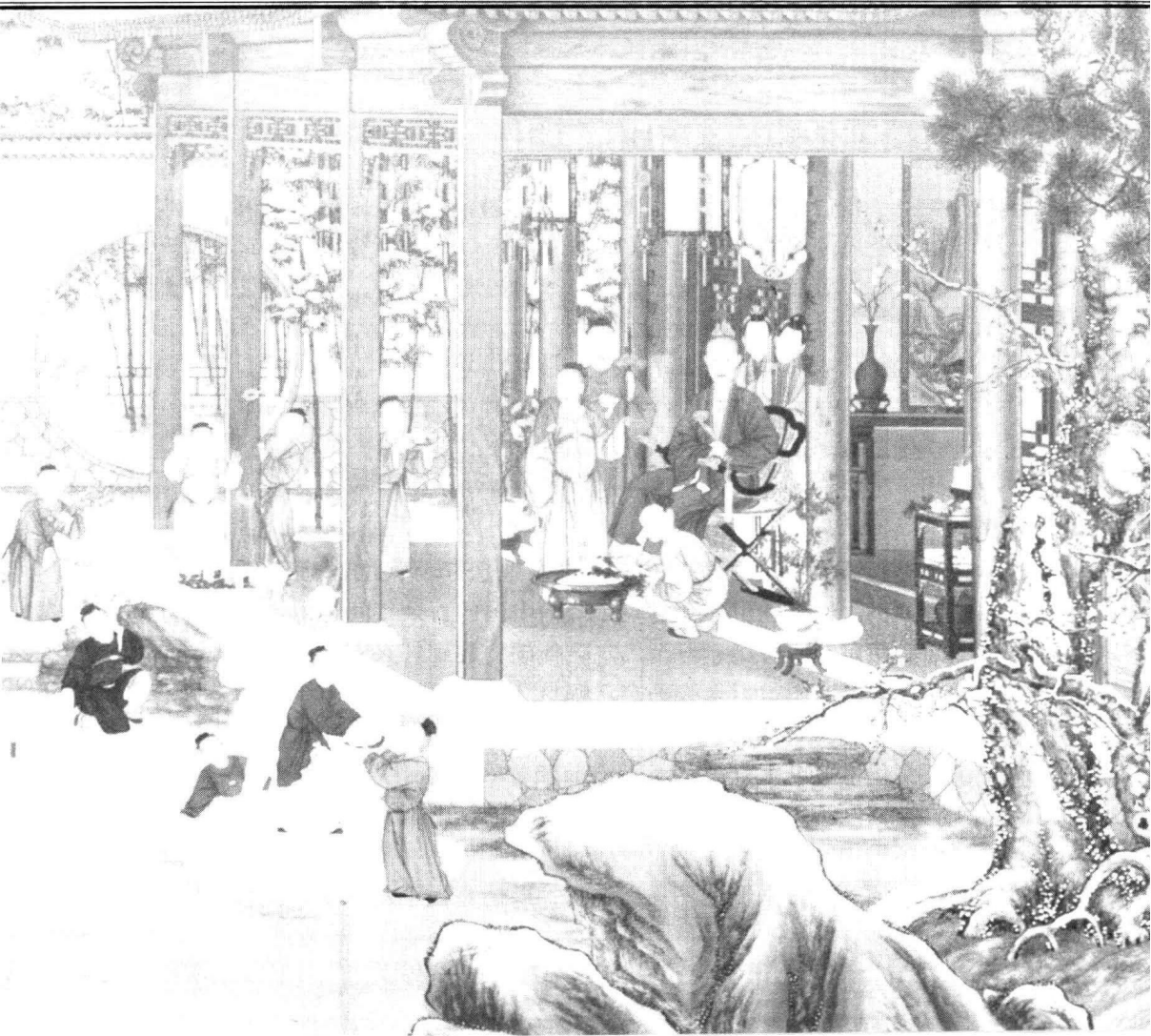


二、今文经学的复兴与经世思潮的兴起	248
(一) 今文经学的复兴	249
(二) 经世思潮的萌动	258
(三) 龚自珍的经世思想	287
(四) 魏源的通经致用思想	296
三、学术与时代	307
(一) 学术与时代	307
(二) 学术与经世	310
附录一 略论刘墉——兼论清中期的政治人物	316
附录二 和珅发迹与清中期政治	331
主要参考书目	352
后记	363

开 篇

傲慢的“英国佬”

——由中英礼仪之争说开去



我们之所以对鸦片战争结局深感震惊，原因就在于国人习惯于接受周边国家的称臣纳贡，从没有经历过外部势力的真正挑战和割地求和的屈辱，更震惊于中华帝国的不堪一击，文明大厦的轰然倒塌。其实，中西势力的转换，早在清代鼎盛时期的乾隆年间即已经显现。最最形象的体现，就是早期中英关系史上的两件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交流事件：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和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

提起清代的历史，人们不由自主地想起清代的康雍乾盛世，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伟大的皇帝统治中国的百余年间，由于他们的励精图治，使东至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北到外兴安岭、南到曾母暗沙的现代中国版图得以最终确定。幅员辽阔的疆域，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终形成、长期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以及相对繁荣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大发展，无不昭示着一个封建时代的昌盛。

根据经济史学家的估计，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口已达近四亿人，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世界生产总值的40%，是当时亚洲头等强盛的封建大国，周边国家无不称臣纳贡，即使是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西



方资本主义殖民势力已经来到东方，并开始在亚洲疯狂进行“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的殖民掠夺，而对于大清帝国这一庞然大物也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尽管早在明清之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就开始了对我沿海地区的骚扰和烧杀抢掠，但一再被中国政府击败和驱逐，更不用说有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想法了。

然而短短40余年的光景，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年），清政府为了杜绝白银外流、遏制英国等国肆意输入毒害中国人的罪恶的鸦片走私，厉行鸦片贸易禁令，这本来从道义和法理上，都是正义之举，却引起英国殖民主义势力的极大不满，悍然掀起对华战争，即鸦片战争。仅仅4000人的英国远征军，就横扫中国沿海地区，迫使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以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发达的中华帝国竟然一步步开始滑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里程。

在我们后人反思这一痛苦的历史经历时，总是震惊于大清帝国的腐败无能，大骂清政府的投降卖国，却往往忽视了中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这是不符合马列主义历史辩证思想的。列宁早就指出：“在分析任何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具體特点。”^②具体到中英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固然有其腐败无能的因素在，但如果一味大骂其投降卖国，导致鸦片战争的失利，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即使是最高统治者，如非白痴，也绝不可能自愿“举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如果片面强调政治腐败在鸦片战争中的影响，我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当时有大批奋起抵抗侵略、英勇捐躯的爱国将士们。因此说，导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两国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军事实力的巨大差异。一支近百年不经战火洗礼的中世纪的军队，面对着一支利用近代科技装备、近代军事理论和技术武装起来的相对现代化的军队，其胜负早已命中注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一、清政府的尴尬

清政府开始取代明朝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西方即开始海外殖民活动，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已经在亚洲掀起殖民狂潮，并把侵略魔爪伸向东方，葡萄牙利用欺骗的手段攫取了我国的澳门，而西班牙和荷兰则先后占据我宝岛台湾，后被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对沿海地区的烧杀掠夺则无时无之。因此清朝统一全国后，沿袭了明代的限制贸易政策，将对外贸易活动限定在广州、福州等5个地区，而且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更以“民俗易器，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由，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三处商口，仅留广州一处对外通商。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还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五条，加强了对外商的管理。为了进一步限制和垄断对外贸易，清政府后来还在广州设立了十三行制度，由官府授权的十三家外贸商人垄断对外贸易。这种贸易体制自然不能满足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对海外市场的贪婪需求，引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大不满。

中英之间的交往并不是始于清代，早在1582年和1596年，伊丽莎白女王曾在两次委托英国商人致中国皇帝的信件中，就表示要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但未能实现。最初英国为西班牙海上势力所阻，向海外发展受到很多限制。1588年，西班牙称雄海上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此后，英国逐渐成了海上霸主。166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它在加紧入侵南亚和东南亚的同时，也将触角伸向中国。18世纪后期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使英国迅速发展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急需扩大海外市场，英国的资产阶级狂热地要求扩大殖民地。而在北美大陆，美国独立战争使英国失去了北美东海岸十三个殖民地，这标志着以北美为中心的殖民体系的结束，加强在东方的殖民扩张成为必要。它们不满足对华贸易的现状，因此要求英国政府以外交手段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对华贸易，决定派遣使团访华，通过与清王朝最高当局谈判，目的是取消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的种种限制和禁令，打开中国的门户，开拓中国市场。同时，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估计中国的实力，为英国资产阶级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依据。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初，马戛尔尼使团以为乾隆帝祝寿的名义来到中国。这是到达中国的第一个英国外交使团，是中英之间最重要



的一次早期交往。对于祝寿而来的马戛尔尼使团，清政府最初是持欢迎态度的，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乾隆帝认为英使远涉重洋，前来祝寿，“具表纳贡”，实属好事。为此他连颁数道谕旨，亲自确定了体恤优礼的接待方针。他不仅破例允许使团从天津上岸，而且命令沿海各省地方官做好接待工作，还向使团提供一切免费供给。^①当年六月，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天津，钦差大臣徵瑞亲赴天津接待。此时乾隆帝正在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避暑，于是决定由徵瑞护送使团经北京赴热河谒见皇帝。

然而，外交接触尚未开始，礼节冲突便已发生。

清政府要求英国使臣按照各国贡使觐见皇帝的一贯礼仪，行三跪九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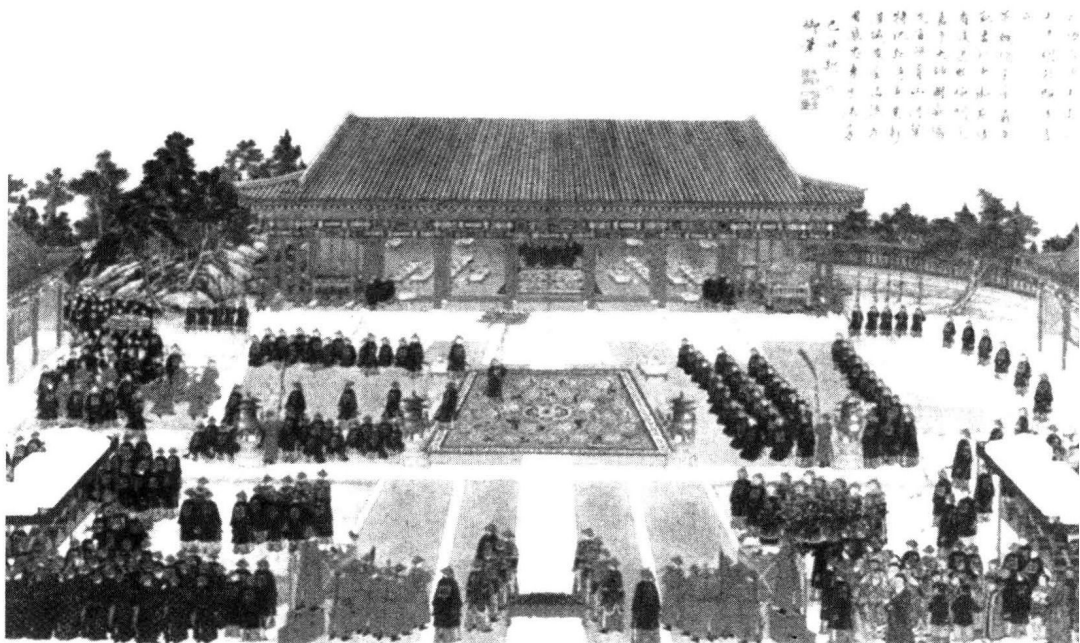
礼。这本来是中国政府对待藩属国的通行惯例，然而英使认为这是一种屈辱而坚决拒绝。礼仪之争自天津，经北京，而继续到热河。由于中英双方都不肯迁就让步，谈判几近破裂。最后，由权臣和珅等人采取一定的变通办法，双方都进行一定的妥协后才终于达成协议。

八月，83岁的乾隆帝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并宴请了英国使团，接



金廷标绘 张福寿堂行乐图局部

^① 《清高宗实录》卷1421，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壬子（18日），谕军机大臣等。



道光皇帝御驾正大光明殿

受了英使呈递的国书和礼品清单，并向英王及使团回赠了礼物^①。觐见时究竟行的何种礼节？中英双方记载不同。但无论当时以何种方式解决这场矛盾冲突，都改变不了礼仪之争对中英首次通使往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清政府认为，进贡和祝寿已毕，英国使团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打道回府。但是，在将英王国书译出后，他们才如梦初醒，知道英国人祝寿的背后是要求使臣驻京和扩大通商。马戛尔尼则急切要求和等待谈判，他向清政府提出了6项要求：（1）允许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2）效仿从前俄国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立商行。（3）在舟山附近划一个小岛给英国商人使用，以便商船停靠存放货物。（4）在广州附近也能有一小块地方让英人自由活动。（5）从澳门到广州的英人货物，优免关税。如果不

^① 《清高宗实录》卷1434，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庚午（9月14日万树园接见英使）。《清高宗实录》卷1434，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三日癸酉（9月17日庆贺礼）。



能免，也请依照 1782 年的税率从宽减税。(6) 英人按照中国所定税率缴税后，不用再上缴任何其他税负^①。这些要求一部分是属于希望改善贸易关系的正常要求，一部分则具有殖民主义侵略性。清政府理应认真研究和区别对待。可是，清政府却简单地一概拒绝，将英国的 6 项要求全部斥为“非分干求”，断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于是，在没有举行谈判、没有完成使命的情况下，英国使团踏上了归程。

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英国政府又派遣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使团来华之后，觐见清帝的礼节又成了争执的焦点。嘉庆帝要求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阿美士德本人对此并无定见，他向两位副使征求意见。埃利斯认为必要时可以妥协，遵从中国礼制。斯当东则坚决反对。由于斯当东当年曾随从其父亲老斯当东陪同马夏尔尼使团来华访问，又一直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是中国问题专家，他的意见实际上又代表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看法。因此，阿美士德采纳了斯当东的意见，坚决拒绝行跪叩礼。清朝负责接待的大臣反复向使臣劝说，甚至以停止入觐，飭令回国施加压力，都毫无效果。嘉庆帝又派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礼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穆克登额二人为钦差大臣，赶赴通州，再行劝说，并以七月六日作为最后期限。

不知和世泰等人出于何种动机，七月二日含糊其辞地奏报：“奴才等会同演习，该贡使等礼节尚未如仪。奴才等现仍设法开导，俟遵照行礼，即行奏闻。”七月五日，在嘉庆帝规定的最后期限的前一天，他们竟联名上奏：“该贡使等仰荷天恩，至诚感服，奴才等随令其演习礼节，起跪不甚自如，勉力尚堪成礼。”嘉庆帝以为英使妥协了，“恭顺可嘉”，下令和世泰等带使臣入京，并钦定了使臣的活动日程。

然而，事情的真相是，所谓演习礼仪完全是和世泰等人的凭空捏造。英国使臣不但没有演习礼仪，而且连类似的口头表示也没有。为了蒙混过关，和世泰决定让使臣头天晚上由通州出发，连夜奔波赶到北京，第二天清晨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朝觐。那时，使臣一定疲惫不堪，行礼时，派员带领，连拉带拖，草草成礼。不料，阿美士德识破此计，到达圆明园后，以礼服未备为由，拒绝入内觐见。而此时清朝的王公大

^① 《英吉利国表文》，见故宫博物院编：《掌故丛编》第 8 辑。

臣早已穿戴齐全，集合等待。嘉庆帝也准备御殿受礼。他传旨召见使臣，和世泰无法应对，谎称：“正使病倒，不能觐见。”嘉庆帝传旨召见副使。和世泰又称：“副使亦病，俟正使痊愈后一同觐见。”



西人笔下的中国人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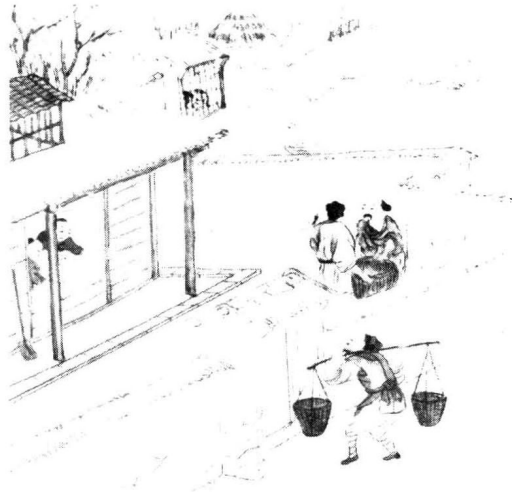
“天朝”皇帝的尊严受到戏弄，嘉庆帝勃然大怒，谕令使臣即日回国，和世泰等人严加议处。为了给英国国王保留一点面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想搞僵中西关系，他下令加恩追收使臣带来的地图、画像等礼品，回赠英王白玉如意、翡翠玉朝珠等礼物，并令广惠伴送英使南下返回广州，所经各省俱派官员沿途照料。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此类事件，嘉庆帝派遣大臣给使团送去一份给英王的敕谕，明确指出：“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阿美士德使团被逐出京城后，按照嘉庆帝指定的回程路线，经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江西5省，历时4月，抵达广州。他们在广州逗留了20天，然后从澳门起航回国。

阿美士德的访华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比马戛尔尼的失败更惨。他到达了北京，却连皇帝也没有见到。因此他不仅没有完成英国政府的使命，而且连提出要求的机会也没有。英国政府派他访华是希望博得清朝对英国的好感，趁机取得在中国的各种特权。然而，礼仪之争却使这一切化为泡影。中英两国关系不仅丝毫未能改善，反而更加恶化，进一步



加深了清朝对英人的戒备心理与敌对情绪。英国政府大失所望，认为用外交方式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从此，英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转变，放弃了和平外交的方式，逐步地形成了用武力摧毁清朝的闭关自守的炮舰政策。

在论及 200 年前的两次中英交往时，后人往往强调清政府的愚昧保守。他们认为：清政府对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进步浑然不知，把西方各国仍然视为“海夷”。他们不假思索地称马戛尔尼为“贡使”，称他们带来的礼品为“贡品”，要求他们遵从中国礼制。清政府孤陋寡闻，拒绝改变闭关自守的落后政策，不愿打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了解世界、扩大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机遇。



嘉庆朝耕织图局部

那么，那场礼仪之争，真的只能一味谴责中国王朝的愚昧、傲慢和荒谬吗？起码有两点理由与此矛盾。

其一，当时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决定了清政府对外部世界需求较少，没有加强贸易的动力。正如乾隆帝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同时，也唯恐外国人与中国各阶层接触频繁，将后患无穷，危及其统治。因此，要“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①。清政府断然拒绝英国的割地要求，明确宣布：“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②这是完全正确的。它维护了国家的主权，抵制了殖民主义的侵略。

其二，尽管在今人看来，礼仪问题属于形式，当时却成了中外交往中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在以儒家文化为主

^① 《清高宗实录》卷 1436，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谕军机大臣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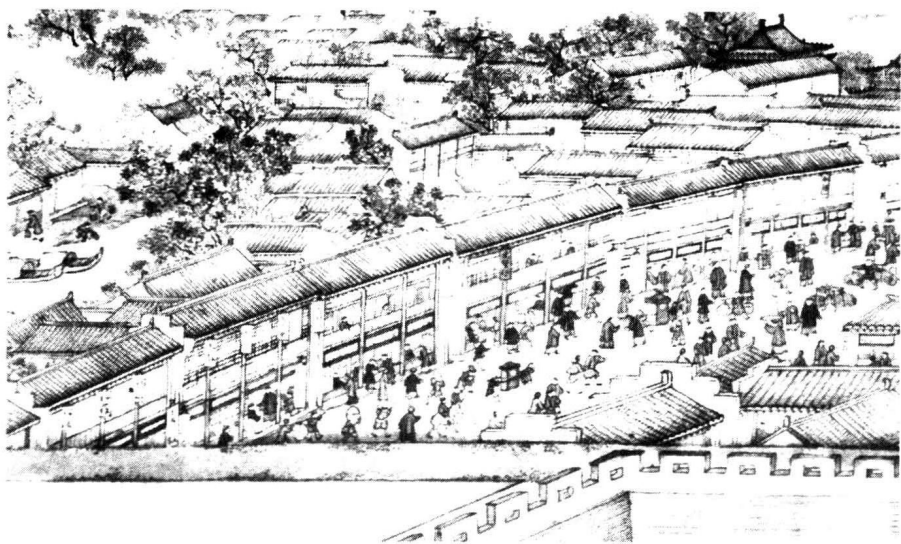
^② 《清高宗实录》卷 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乙卯，敕谕英吉利国王。

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礼”具有突出的地位。在各种礼仪中，君臣之礼尤为重要。臣民匍匐于君主脚下，向君主行跪拜礼被视为是天经地义，是对君主至高无上地位的承认和服从。中国又始终以“天朝上国”自居，历代的统治者都制定有一套繁复的朝贡礼仪。朝贡国必须严格遵守这些礼仪，才能表明其向化的诚意。这在今天看来也属于主权范畴。

因此，即使是当时西方的大政治家拿破仑也有此种观点。据说，1817年，被英国军队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会见了刚刚从中国归来的英国使臣阿美士德。拿破仑仔细研究了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的文字材料，认真听取了阿美士德关于中国之行的介绍。他对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不给中国皇帝下跪提出了批评，他说：外交官拒绝叩头就是对皇帝不敬。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提出中国国君答应如派使节去英国也要他叩头！中国人拒绝得对。一位中国的使节到伦敦应该向国王施英国大臣或嘉德骑士勋章得主一样的礼。你们使节的要求完全是荒谬的。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们的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做与他地位平等的人。被派到土耳其的勋爵在受苏丹召见时难道可以不穿要求的皮里长袍吗？一切有理智的英国人应该把拒绝叩头看成是不可原谅的事。觐见中国皇帝却要遵行英国的习俗，这是没有道理的。

拿破仑坚定地认为，外国使臣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习俗给所出使国君行礼，而必须按照所出使国的习俗给所出使国君行礼。为了加强表达效果，他甚至用了一个粗俗的说法来阐明这个道理：“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马戛尔尼使团出发时，内务部长敦达斯还特地谆谆告诫：“您一到便要受到接见，您要服从中国朝廷的礼仪，既不要损害自己君主的尊严，又不要被礼仪上的小事束缚住手脚。”

既然礼仪形式在东西方都被看成是事关主权的大事，我们在谈论200年前的那场礼仪之争时，我们又如何片面地将其归结为中国王朝的愚昧、傲慢和荒谬呢？应该说，当时的清政府确实不了解西方的社会发展情况，更不了解平等礼仪的概念；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贸易活动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但作为一个一直以来文明发达的东方大国，他坚持遵从中国固有的礼仪，拒绝英国人割据领土的无理要求，又有什么错呢？他们甚至容忍这些“野蛮”的外来者对礼仪的变通，以及对皇帝尊严的羞辱，难道不值得同情吗？只是，深层的原因，是经过长期的社



《姑苏繁盛图》之城市商业

会经济大发展，西方人积聚起了底气，不再愿意接受他们认为的，已经衰落的帝国应有的权威而已。

在以前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中华帝国一直可以凭借自己传统的文明优势和幅员辽阔的大国优势雄踞于亚洲东部，周边国家无不争相与帝国保持藩属关系，中国皇帝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万国来朝的局面，他可以用断绝朝贡和贸易关系的方法来使对方屈服，甚至可以以自己深厚的文明内蕴，不断将周围落后的民族政权，即使是一度非常强大的征服者融化在自己的文明海洋里，使它们永远失掉自己的民族本性。可以说，它从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外部威胁。

随着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殖民主义浪潮汹涌激荡，被旅行家马可·波罗所描绘的神秘的遍地黄金的中国及远东地区，就成为贪婪而血腥的殖民主义者虎视眈眈的攫取目标。在此情况下，尽管清朝前期政府仍然可以创造四征不庭的辉煌业绩，营造出空前绝后的康雍乾盛世，最终实现历代统治阶级梦寐以求的政治上大一统、封建经济文化更为繁荣昌盛的局面，取得足以令他们自豪的业绩，但对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东来，不能不心存疑虑。对西方科学知识怀有浓厚兴趣，并亲自领导驱逐霸占雅克萨的沙俄侵略势力的康熙皇帝，对西方殖民势力也曾忧心忡忡：“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